

挖掘中东动荡复杂根源 || 把握中东巨变历史脉络

中东政治专题研究

STUDIES ON MIDDLE EASTERN POLITICS

刘中民◎著

时事出版社

挖掘中东动荡复杂根源 || 把握中东巨

中东政治专题研究

STUDIES ON MIDDLE EASTERN POLITICS

刘中民◎著

时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东政治专题研究/刘中民著. —北京: 时事出版社, 2013. 12
ISBN 978-7-80232-672-9

I. ①中… II. ①刘… III. ①中东问题—文集 IV. ①D815.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81547 号

出版发行: 时事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寺甲 2 号

邮 编: 100081

发行热线: (010) 88547590 88547591

读者服务部: (010) 88547595

传 真: (010) 68418647

电子邮箱: shishichubanshe@sina.com

网 址: www.shshishe.com

印 刷: 北京昌平百善印刷厂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40.25 字数: 646 千字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11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以下建设项目的经费支持：

上海外国语大学 211 工程重点学科建设项目

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市一流学科“政治学”
学科建设项目

上海市高等学校智库“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
研究所”建设项目

自序

——从事中东研究二十年有感

中国圣贤孔子曰：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孔子哲言的落脚点在于，无论是“天子”还是“庶人”，为人之本在于“修身”。对于属于“庶人”的多数人而言，终其一生如能达致“修身”、“齐家”已实属不易，而能参与“治国”、“平天下”者只是凤毛麟角而已。身为凡人，我们虽远离“治平”之伟业，却无法逃脱“修齐”之身家生活。“修身”之难在于它需要完成“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一系列相互联系的重要环节，正所谓“如切如磋者，道学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

如果从修身的角度来看待学术研究，学术研究也就是修身的过程。学术追求基本上可以概括为“格物致知”和“诚意正心”两个相辅相成的环节。“格物致知”是在认识层面对事物本原的探究，“诚意正心”是精神和伦理层面的价值追求，二者相辅相成、互为支撑。通俗地讲，“格物

致知”和“诚意正心”是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两大基石，亦即许多学界前辈所言的“道德文章”，“诚意正心”乃道德修行的为人之道，“格物致知”乃学术研究的为学之道。知识分子一生的活动都围绕道德文章而展开，荣辱褒贬均系于“诚意正心”的道德修养和“格物致知”的学术素养。

在已过不惑之年且直奔天命之年之际，虽已不致为生存之忧所困，但仍难免为世俗名利所扰。虽身为凡夫俗子，在闲暇时重读孔子名篇《大学》，却也围绕“修身为本”多了几分不同以往的感悟。感受之一是“君子必慎其独”的重要性，“慎独”是达到“诚意”的根本；感受之二是“修身在正其心”的重要性，身有“忿惕”、“恐惧”、“好乐”、“忧患”，“则不得其正”。

本书的序言之所以从重读《大学》的感受谈起，其原因主要有二，这也是作者决定选取从事中东研究 20 年的主要论文结集出版的原因。首先，本人试图以慎独和自省之心，对自己从事中东研究二十年的历程进行回顾与反思，鞭策自己敬畏学术、敬畏道德，并从中获取未来为人为学的精神动力。其次，中东研究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中乃偏僻一隅，国际问题研究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乃未成体系之学，亟需我辈树立道德自觉和学术自觉，为中国中东学、国际关系学早具雏形及至自成体系添砖加瓦。

与中东研究偶然结缘

我与中东研究的结缘实属偶然，时至今日仍有阴差阳错之感，也时常感叹命运造化的难以抗拒。我于 1968 年出生于冀东偏僻农村，虽家境贫寒，但也生逢变革时代，乃有凭借高考在 20 世纪 80 年代走出大山、进城求学之机遇。像那个时代的许多农村孩子一样，参加高考完全出于功利，最直接的目的在于能拥有父辈所期待的体面的工作和生活，全然不知学术为何物，遑论从事国际问题研究和中东研究。

虽出身农村寒门，但我所在的家族尚属读书之家，前辈和同辈中有多人

考入大学，同时也多有爱好文学之人，少许的文学著作也成为我能够阅读到的唯一一种课外书。因此，那时的梦想是考取国家全部负担学费并有生活补助的师范院校，毕业后回乡做一名中学语文教师。

除文学外，我感兴趣的另一领域是历史，当然那时对历史的理解远非真正的历史学。最初接触到的所谓历史来自地方戏（如儿时痴迷的冀东皮影戏），传统评书（那个年代农村最具影响的娱乐方式），以及祖父炕头泛黄的破旧历史小说（如《水浒传》）中的野史。稍后接触到的一点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得益于高中历史教师潘敏老师的博学，他在教授基本历史知识的同时，常有当时在我看来非常高深的知识拓展与评论。那时在世界历史课程中了解到的巴比伦王国、波斯帝国和阿拉伯帝国，以及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伊斯兰教，构成了我最早接触到的关于中东的历史知识。在我参加高考的1987年，潘敏老师考取了南开大学历史系的硕士研究生，这也是我第一次知晓大学毕业后还可以通过攻读研究生继续深造。回想起来，这对我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大学期间与潘敏老师的继续交往，构成了大学毕业时选择攻读研究生的最直接原因。

我的高考成绩并不理想，起码与平时成绩有非常大的差距。其结果是，我未能如许多老师的期待考取重点大学，仅考取了地处省城石家庄的河北师范学院（现已并入河北师范大学），也未能实现学习中文和历史专业的夙愿，阴差阳错地被政治教育专业录取。入学后方才了解到，中文和历史专业的录取分数要略高于政治教育专业。学习政治教育专业便成为我与政治学结缘，乃至后来与中东政治研究结缘的起点。

在四年的政治教育专业学习中，所学内容十分庞杂，包括哲学、经济学、历史学、法学、心理学、伦理学、管理学、宗教学等几乎所有社会科学学科，虽然对这些学科的学习只能是入门的基础，但回想起来却觉得十分受用，起码使自己的知识视野大为开拓。

大学期间对我影响最深的是讲授政治经济学的刘永瑞教授，他是一位博学善辩、勤于思考，同时有惊人记忆力的青年学者，至今仍能回忆起他在课堂上信手拈来大段背诵《资本论》的奕奕神采。也许是出于对博学者们的崇拜，我大三的学年论文和大四的毕业论文都选择了刘永瑞教授为指导教师，并有幸得到悉心指导和严格要求。我的毕业论文“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国民经济军事化”经刘老师数次修改，后来于1993年正

式发表,成为我的学术处女作。后来的20多年里,刘永瑞老师因能力出众,先后出任学校副校长、教育厅长、省委统战部长等职务,直至目前担任河北省政协副主席。在河北学习和工作期间,还经常有幸得到刘老师的教诲。后来因工作调动离开河北后,由于奔波忙碌,已许久未能与刘老师联系。但每每静坐回忆往事时,仍对刘老师的学术启蒙心怀万分感激。

我上大四的1990年,适逢河北师院政教系设立“当代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硕士点(隶属于马克思主义教育学科),已经对学术研究产生一定兴趣的我决定报考,也算经过过关斩将,成为该专业于1991年招收的两名硕士研究生之一,师从王仲义教授从事“宗教与第三世界政治”研究方向的学习。王仲义教授当时主要从事宗教与中东政治研究的开拓性工作,这也成为我走进中东研究领域的首要原因。

王仲义教授于20世纪60年代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系世界史专业,擅长历史研究。先生指导学生的最大特点是为人平和、尊重个性。由于我对中东的了解近乎于空白,先生要求我广泛学习关于中东历史、民族、宗教、国际关系等领域的基础知识,但却从不强加任何规定性的任务,还算自觉的我十分适应这种学习方式。我的师弟田文林也很喜欢这种学习方式,他目前就职于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已是国内中东研究领域的知名青年学者。

在具备了初步的知识基础后,我于1993年选择“论伊斯兰教对中东政治的影响”作为硕士学位论文题目,主要从中东国家政治发展和中东国际关系两大视角,分析伊斯兰教对中东政治的影响,最后形成了8万余字的硕士学位论文。由于题目过大,其内容自然十分粗糙,但该领域的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初尚属于前沿性研究,因此在论文答辩中得到了专家学者的充分肯定。

在准备论文的过程中,在导师王仲义先生推荐下,我有幸结识我国著名伊斯兰问题专家、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吴云贵先生,并曾经在1993年到世界宗教研究所聆听先生教诲,使我颇有茅塞顿开之感。后来,吴云贵先生不仅拨冗作为答辩委员会主席参加了我的论文答辩,还曾在百忙之中仔细批改我的两篇论文,即《宗教对国际政治的影响》和《伊斯兰与西方——兼评“伊斯兰威胁论”》,后来分别发表于学术期刊《欧

洲》杂志的1996年第5期和1997年第3期，对于引导我走上学术道路影响颇深。

从事中东研究的起步阶段

以1994年参加工作、1998年考取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和2002年、2007年两次调动工作为分界线，我从事中东研究这20年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基本是每五年一个周期。

1994—1998年是我从事中东研究的第一个阶段。

1994年硕士研究生毕业后，我在河北师院政治教育系留校任教，主要从事“宗教学概论”、“政治学”、“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等课程的教学工作。虽然教学任务繁重、生活条件艰苦，但今天回忆起当年在筒子楼陋室备课和写论文的情景，却多是苦中有乐的充实感。

在为本科大学生授课的四年间，对宗教学、政治学、国际关系学理论的学习，对后来的学术研究大有裨益，其最重要的收获是使我的学术视野并未狭隘局限于中东研究领域，而是拓展到政治学和国际政治的相关领域，而这反过来又增强了中东研究的理论深度。在此期间，经过努力，我在修改完善硕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整理发表了10余篇、总字数20余万字译文与论文，它们分别是：

1. 《世界新格局下的伊斯兰教》（译文），载《世界宗教资料》1993年第4期。
2. 《关于冷战后全球民族主义的多维思考》，载《世界经济与政治》1995年第12期。
3. 《伊斯兰教与阿以冲突的关系探析》，载《西亚非洲资料》1995年第1期。
4. 《从三大国际冲突看伊斯兰教对国际政治的影响》，载《西亚非洲资料》1996年第1期。
5. 《伊斯兰教与两伊战争》，载《中东》1995年第1期。

6. 《冷战后国际政治形势的特点》，载《现代国际关系》1996年第5期。
7. 《冷战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新特点》，载《世界宗教文化》1996年夏季号。
8. 《伊斯兰教、民主与西方》（译文），载《国外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6年第2期。
9. 《伊斯兰教与当代伊斯兰世界的国际合作》，载《世界经济与政治》1996年第11期。
10. 《宗教对国际政治的影响》，载《欧洲》1996年第5期。
11. 《论伊斯兰教在当代中东伊斯兰国家的社会调控作用》，载《宁夏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
12. 《伊斯兰教在当代中东伊斯兰国家的社会分化作用》，载《宁夏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
13. 《伊斯兰与西方——兼评“伊斯兰威胁论”》，载《欧洲》1997年第3期。
14. 《冷战后伊斯兰教影响中东政治与国际政治的历史走向》，载《宁夏社会科学》1998年第2期。
15. 《对中东的在思考》（译文），载《高校社科情报》1998年第3期。
16. 《文化与国际政治的关系管窥》，载《欧洲》1998年第5期。

从事中东研究的深入阶段

1998—2002年是我从事中东研究的第二个阶段。

1998年，也是我的而立之年。从功利的角度说，那是我收获颇丰的一年。正是在那一年，我申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伊斯兰复兴运动与当代中东伊斯兰国家社会历史发展”获得成功；随后又于当年9月考取了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师从我国著名非洲问题专家陆庭恩先生学习深造；那年岁末，我在担任讲师两年后破格晋升为副教授。

成绩的取得总是离不开师长的提携，期间对我帮助最大的莫过于我大

学期间的授业恩师王凤鸣老师。在河北师范学院于1997年并入河北师范大学后，当年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毕业的王凤鸣老师出任法政学院院长，也就是我工作单位的领导。王老师虽仅年长我5岁，但却是我进入国际问题研究的领路人。大学期间，王老师讲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至今我仍清晰地记得，正是他在课堂上对苏联东欧问题的深入分析，使我对国际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大学和硕士研究生期间，我和另外几位同学都曾在学业和生活上得到王老师的无私帮助。他从北大学成返校工作后，在频繁的工作和生活交往中，我在学术上多次得到他的指点与提携。正是通过王老师的介绍，经庞中英师兄（现已是国内知名的国际问题专家）推荐，我才得以认识北京大学的陆庭恩先生，并于1998年师从先生攻读博士研究生。后来，王老师先后担任河北经贸大学、河北大学副校长，联系虽少，但我对王老师予以的巨大帮助却始终不敢忘怀。

北大三年求学对我的学术成长至关重要。陆庭恩先生堪为典范的为学、为人之道，都使我对北大的优良学术传统感受至深。陆老师指导博士生的研究方向是“当代世界民族与民主”，并主要研究民族问题，而我有限的研究基础在于中东伊斯兰问题研究，并且当时正在从事相关的国家社科基金的课题研究。因此，经过多次交流，先生点拨我可在“伊斯兰复兴”、“中东民族主义”、“中东政治”几个方面寻找结合点，使我很快选择“中东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关系”作为博士论文的研究选题。这一领域也成为我近十余年来长期研究的领域，可谓使我终身受益。

陆庭恩先生在中国非洲史学界是当之无愧的领袖，许多非洲研究的后起之秀都曾得到其大力提携。2006年，先生已届七旬，在卸去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主任的行政职务后，出于对身体健康的自信，他制定了非常庞大的研究计划，并开始着手工作。但也许正是由于过度劳累，先生突然因患严重中风住进了医院。经治疗虽生活能够基本自理，但他的非洲研究事业却已无法继续。先生从事非洲研究，我从事中东研究，在研究领域上并无太多交集，但先生的治学方法与为人之道却使我受益终生，没齿难忘。

2000年底，也就是我博士毕业的半年前，我在担任副教授两年后破格晋升为教授，当时也是整个河北师范大学最年轻的教授之一，成为我攻读博

士期间取得的最大收获。

2001年7月,在博士顺利毕业后,我返回河北师范大学法政学院任教。坦率地讲,各种主客观因素使自身的心态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在此背景下,我对学习和工作达十几年之久的城市石家庄顿生厌倦,并于2002年12月进行工作调动,奔赴美丽的海滨城市青岛,到中国海洋大学法政学院从事教学科研工作。

客观而言,1998~2002年既是学业、事业大有收获的5年,也是生活、事业压力最大的5年。虽面临诸多压力、困惑与迷茫,但对学术的真诚追求并无改变,并在中东研究和国际政治研究领域内发表了10余篇学术论文,出版了学术专著2部。它们分别是:

- 1.《国际政治社会学》(合著,第一作者),中国军事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 2.《文化与当代国际政治》(合著,第二作者),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 3.《文化对冷战后国际政治的影响与跨世纪中国文化战略的构建》,载《中国软科学》1998年第3期。
- 4.《伊斯兰复兴运动与中东现代化的互动关系》,载《西亚非洲》1999年第2期。
- 5.《关于冷战后世界民族主义的若干认识》,载《世界民族》1999年第4期。
- 6.《犹太教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影响》,载《世界民族》1999年第2期。
- 7.《科索沃战争与冷战后国际秩序》,载《欧洲》1999年第5期。
- 8.《国际政治社会化初探》,载《世界经济与政治》1999年第3期。
- 9.《伊斯兰复兴运动与土耳其的社会历史发展》,载《宁夏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
- 10.《伊斯兰复兴运动与当代埃及》,载《西亚非洲》2000年第3期。
- 11.《当代中东伊斯兰复兴运动的政治文化机理》,载《宁夏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
- 12.《安东·萨阿德的民族主义思想宗教观》,载《西亚非洲》2001年第2期。

13.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对民族主义的思想挑战》，载《世界民族》2001年第6期。
14. 《埃及的地方阿拉伯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载《世界民族》2001年第3期。
15. 《试析影响国际格局的民族主义因素》，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8期。

从事中东研究的调整阶段

2003—2007年在中国海洋大学工作的近5年时间，是我从事中东研究的第三个阶段。

初到青岛的2003年，除承担并不繁重的教学任务外，休养生息、调整心态成为我最主要的任务。游走崂山的秀丽山水，漫步风景如画的黄海之滨，这种寄情山水的生活，的确让人有“思接千载”、“心游万仞”的释然与惬意。

经过调整后，以淡泊和安静的心态从事教学科研工作成为我最大的乐趣。但不久后我便发现，对于以海洋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为特色，并以理工学科见长的中国海洋大学而言，我所从事的中东研究无疑是边缘之边缘。在学校以海洋科学为支撑，着力打造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的浓郁氛围下，融入学校的主流学科，以自身具有的一定的国际政治研究为基础，从事海权理论和海洋战略研究，成为无法规避的选择。

在海洋研究和学科建设领域，我从事的工作主要有二：首先，积极参与学校的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建设，尤其对申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发展研究院”、具有海洋研究特色的国际政治硕士点等工作奉献了一己之力。其次，以文献整理为起点，围绕海权与大国兴衰、中国海权战略、海洋权益争端、中国近代海防思想、国际海洋环境制度等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通过近五年的耕耘也算颇有收获，相继在核心期

刊发表了十余篇论文,并有专著出版。^①

当然,对于当时已经从事近十年之久的中东研究,无论如何也是难以割舍。但在该领域的研究中,由于在青岛工作期间与中东研究学界渐行渐远,其研究基本上已属个体户式的单独研究,同时也需要在海洋问题研究与中东研究两大领域之间平衡用力,其艰难困苦只有自己心知肚明。

总之,在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海洋问题研究的情况下,在中东和国际政治领域的研究主要是吃老本,能对中东研究保持不舍不弃已属不易,也算为后来回归中东研究积累了一点资本。那五年在中东研究领域从事的工作主要包括:第一,基于深入研究中东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关系的需要,对民族主义理论进行了系统的学习和思考,并主要围绕民族主义与当代国际政治进行了一定的研究。第二,对过去完成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的最终成果和博士学位论

① 在中国海洋大学工作期间,我在海洋研究领域取得的主要成果包括:

《中国近代海防思想史论》,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国际海洋政治专题研究》(合著,第一作者),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国际海洋制度导论》(主编),北京:海洋出版社 2007 年版。

“海权争霸与俄苏的兴衰及其历史反思”,载《东北亚论坛》2004 年第 6 期。

“复合相互依赖论与海洋政治研究”,载《太平洋学报》2004 年第 7 期。

“海洋领域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及其对当代国际关系的影响”,载《中国海洋大学学报》2004 年第 4 期。

“试论邓小平的海洋政治战略思想”,载《中国海洋大学学报》2005 年第 5 期。

“中国海权发展战略的若干思考”,载《外交评论》2005 年第 1 期。

“海权问题与中美关系:矛盾的认知与艰难的选择”,载《外交评论》2005 年第 6 期。

“《海底政治》述评——兼论国际海底政治的新发展”,载《中国海洋法评论》2006 年第 1 期。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国内南海问题研究综述”(合著),载《中国海洋大学学报》2006 年第 3 期。

“近十年来国内钓鱼岛问题研究综述”(合著),载《中国海洋大学学报》2006 年第 1 期。

“地缘政治理论中的海权问题研究”(合著),载《太平洋学报》2006 年第 3 期。

“中日海权争端的态势及其对策思考”,载《太平洋学报》2006 年第 3 期。

“海权问题与中美关系述论”,载《东北亚论坛》2006 年第 5 期。

“中国与国际海洋制度的互动关系”,《中国海洋大学学报》,2007 年第 1 期。

文修改完善和整理出版,同时整理发表了几篇相关的学术论文。它们主要包括:

1. 《当代中东伊斯兰复兴运动研究》,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2. 《挑战与回应:中东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关系评析》,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
3. 《民族主义与当代国际政治》(合著,第一作者),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
4. 《萨达姆之后:美国中东霸权面临的挑战》,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5期。
5. 《关于伊斯兰复兴运动术语、概念和类型研究的学术讨论》,载《宁夏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
6.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视野中的非传统安全研究》,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4期。
7. 《伊斯兰复兴运动对中东伊斯兰国家关系的影响》,载《宁夏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
8. 《伊斯兰复兴运动与当代中东政治发展》,载《宁夏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
9. 《纳赛尔的阿拉伯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载《宁夏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
10. 《中东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关系评析》,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07年第3期。
11. 《萨提·胡斯里的阿拉伯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07年第1期。

从事中东研究的再创业阶段

在青岛的近5年工作可谓有得有失。对世界海洋政治进行的开拓性研究可谓得,这使得我在近几年不断趋热的海洋研究中仍拥有一定的话语权;与中东研究渐行渐远可谓失,当时几乎是通过吃老本使自己尚能够保持与中东研究的联系。至2006年前后,由于海洋问题研究的任务日趋繁重,我长期

从事的中东研究已近于停滞，但十余年间对中东研究的深厚学术感情又实在令我心有不甘。

正在困顿茫然之际，时任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中国知名中东问题专家朱威烈先生为我回归中东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机遇。2006年岁末，朱先生亲自致信诚邀我加盟中东研究所。收到邀请后，我虽对朱先生的盛情邀请心怀感激，但已经小有成绩的海洋研究，青岛的舒适生活环境，上海令人恐惧的房价等生活压力，都令我难于迅速做出举家南迁上海的决定。因此，最初我只能无奈地选择婉拒，但从事中东研究的诱惑以及上海更好的学术氛围，又让我始终难以压抑到上海工作的冲动。

在几经思想斗争后，我还是决定南下上海、回归中东研究。2007年9月，我正式进入上外中东研究所工作。中东研究所作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具有政策研究和国际化水平较高的鲜明特点。来上海之初，朱威烈教授在工作和生活方面提供诸多关照的同时，也殷切地希望我能把提升政策研究和国际化水平作为工作的重点。对于长期从事基础研究和理论研究的我来说，完成这种转型和重塑无疑是一种沉重的压力。进入中东研究所工作近六年来，自己虽远未完成彻底的转型，但在朱威烈教授的指点与提携下，在自身的不断努力下，我从事中东研究的领域和方式亦已发生深刻的变化。

变化之一是从单纯的基础研究向基础研究、动态研究、政策研究相结合的转变。近几年来，在继续从事伊斯兰复兴、中东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等领域基础研究的同时，对中东热点问题、反恐问题、中东国家外交、大国中东战略、中东变局、中国与中东关系等问题均已有所涉略，动态研究和政策研究的内容得到较为明显的加强。

变化之二是迈出了国际化的第一步。在进入上外中东研究所工作之前，自己在中东研究领域的国际交流近乎于空白，更无到中东国家进行考察、调研的经历，因此完全是一种书斋内的静态研究。近几年间，受益于中东研究所这一国际交流平台，除能够在研究所内广泛接触来访的国外人士外，还两次到美国参加学术会议，五次到中东国家进行学术访问和调研，走访了沙特、卡塔尔、阿联酋、叙利亚、黎巴嫩、埃及、苏丹、利比亚、以色列等近一半的中东国家，近距离观察了南苏丹独立和“阿拉伯之春”等重大历史事件，使自己的中东研究增加了许多现场感。

变化之三是研究成果的多元化和通俗化。较之过去主要撰写纯学术的专

著与论文，近年来结合动态研究和政策研究，通过做讲座、接受媒体采访、撰写时政评论和调研报告等方式，不断适应学术研究应服务于国家与社会需求的发展趋势，逐步实现了研究成果的多元化、通俗化，尤其是结合近三年来的阿拉伯大变局，在《人民日报》、《环球时报》、《世界知识》、《文汇报》、《解放日报》、《中国社会科学报》、《东方早报》等大众媒体发表了几十篇时政评论（具体情况参见本书附录），对引导社会舆论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变化之四是积极参与中东研究的学科建设、智库建设。近几年来，积极参与了政治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和博士后流动站、自主设置二级学科“中东研究”博士点、211工程3期建设项目“中国特色的阿拉伯学—中东学”、上海市高等学校智库“中东研究所”等学科建设项目的申报与管理工，积极致力于中东研究所的“思想库”、“信息库”和“人才库”建设，为中东研究所的学科建设和智库建设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近六年来，由于工作内容的增加，尤其是在承担行政管理工作后，如何平衡繁杂的行政事务和学术研究的关系，始终是自身面临的最大困惑。这里我必须对现任中东研究所名誉所长的朱威烈先生深表谢意与敬意。几年来，朱先生多次在思想上释疑解惑，在工作上排忧解难，才使自己能够克服畏难情绪，不断探索前行。而他在大病初愈后依然不遗余力地坚持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的精神，更是堪为楷模。

在中东研究所工作期间，虽然为学术之外的许多繁杂事务所累，但我对学术研究始终不敢懈怠；在加强动态研究、政策研究的同时，也从不轻视作为学术根本的基础研究。近六年来，在中东研究和国际政治研究领域仍产生了一批较为规范的研究成果。它们主要包括：

1. 《民族与宗教的互动：阿拉伯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关系研究》（专著），时事出版社2010年版。
2. 《中东地区发展报告：中东变局的多维透视》（2012年卷，主编），时事出版社2013年版。
3. 《中东民族国家建设中的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载《国际观察》2008年第5期。
4. 《巴列维王朝时期的伊朗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载《宁夏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
5. 《从族群与国家认同的矛盾看阿拉伯国家的国内冲突》，载《阿拉伯